



## 本分

大家小聚

张克澄

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提面命：做人要本分。什么是本分，怎么做才是本分，却从未具体解释过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父母是用言传身教，诠释了本分的内涵。

2001年初，父亲张维到旧金山湾区住了一个多月，期间和我有多次长谈。仿佛是交待后事，又仿佛是总结一生。以前很少议论别人的父亲，讲了对很多人的评价，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一点父亲的内心。

他说，自从成为资深院士，不再有院士推荐权，前些年门庭若市、络绎于途的各类学生们不登门了，倒给了他时间想想事。名利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很多人追逐了一辈子，究竟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真正明白。其实人只要本本分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，把事情真正做好了，该有的总会有的；没有也不用太计较。你妈妈和我，一辈子不做力所不及的事，不巴结任

何人，到头来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衣食无忧专于任事，也算是不虚此生啦。

他又说，这些年老有人来请我做顾问，大多是冲着两院院士头衔来的。每月给你几千块钱，一年开上一两次会，到了会上又非让你讲话。有些事我根本不懂又不在第一线工作，说错了让人笑话，不说又不行，只好讲讲原则，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把大多数都辞了，只留了几个自认为还多少懂一些的应景，也算对得起那个顾问费。

一天晚上，他喊我到他房里，关上房门说有很重要的事交待。父亲告诉我，最近开始整理些资料，准备过一两年趁身体精力还好，写写回忆录。算了一下，到目前为止，他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中，当了院士的，像黄克智、龙驭球，有23个。如果加上学生自己认他当老师，但他认为只是指导过没有手把手教的，像过增元，则是35个。我请他细细数给我听，他答应

回北京写下后给我寄来。当时父亲身体健朗，能吃能睡，血压120/80，心跳68下/分，也没有糖尿病等老年病，还能时不时打打网球。连医生都说父亲能活过一百。谁知人有旦夕祸福，父亲竟因急性传染性肝炎几个月后就驾鹤西去！在父亲百年诞辰时，我们想把他提到的这些学生名单整理出来而不可得，至为遗憾。衷心希望父亲张维的学生们或知情者能通过《水木清华》编辑部与我联络，补上这份有价值的史料。

有几件典型事例可以佐证父母做人的本分。

共产党进了城，掌了权。北京市委的彭真、刘仁恰好与父母有历史渊源，先后来清华看望他们。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姐姐张洁洵是母亲陆士嘉儿时的闺蜜，张洁清其时跟着姐姐“三姐三姐”的叫，曾经极为熟识。刘仁与父亲是师大附中同班同学，刘仁班里最年长，父亲功课好但年幼体弱，受同

学欺负，刘仁常挺身而出保护父亲，结下了友谊。大事安定下来后，刘仁抽空就来看望父母，开导他们认识共产党，进而加入共产党。父亲是学土木的，刘仁希望父亲能到北京市当负责城建的局长，为新北京的建设出力。父母商量，觉得共产党打天下时自己没参加，坐天下时却来分杯羹，此事绝不可为，坚辞不受。

1953年刘仙洲入党，给父母极大震动，也开始积极向共产党靠拢。他们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标准太远，需要好好改造思想，努力跟党走，争取早日入党。父亲经常向自己的联系人解沛基汇报思想，检讨自己的不足，请求组织的指导。1956年某日，蒋南翔问解沛基，好几年了张维怎么还没有入党？解沛基答，我们认为张维已达共产党员标准，但他至今还没写入党申请书，无法履行手续。原来父亲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标准尚远，还不到申请的时候。解沛基反复做工作，父亲才写了申请书，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钱学森建立五院后，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，授少将军衔。申请获批只待履行手续。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，时任院长兼书记武光坚决不放。母亲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，又对这少将军衔愧不敢当，认为全军只有一位女少将李贞，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贡献卓越，自

己不过是多念了几年书，于革命毫无贡献，当不起这荣誉，始终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。钱学森不死心，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聊天，坚持做说服工作。直到1962年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期间，母亲突发心肌梗塞，经北京医院抢救成功，人保住了，却不得不离职修养了一年多。病愈后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作了，去五院的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和安全，决定配专车接送她上下班。母亲认为学院车紧张，自己走走路既节约了资源又锻炼了身体，推辞不受。北航坚持要派。于是，每日早晨，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母亲，母亲则视而不见，过车不入，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营31路公共汽车站，后面跟着一辆黑色轿车。等母亲上了31路，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她下车。到了那里，母亲当然更不会上车了。双方僵持了几个月，北航只好放弃了。

文革结束，科学的春天来了。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（现称院士）172人，经过二十多年和文革，很多已过世，需要增选。第二批学部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，母亲在列。这个名单产生条件是有3位学部委员推荐，母亲由严济慈、周培源、钱学森等7位推荐而获选。父亲为避嫌没有参

加推荐。得知这个结果，母亲没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，给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了封信，说自己年龄偏大（68岁），身体不好，能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，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。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风亮节，接受了母亲的请求。严老得知母亲此举，大为不快，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，说多少人想我推荐我没答应，你怎么可以推掉呢，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水平的大事呀！多年后，母亲谈起此事，并不后悔，但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的缺陷，算是小小遗憾吧。

母亲这样做，其实早有先例。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，父母均定为高教一级。母亲认为自己学识资历均在沈元、王德荣之下，不宜与他们同级。申诉未果，便自降一级，坚持领二级教授的薪金，填表也只填二级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只好随她了。

这些故事，今天的年轻人觉得是天方夜谭。但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，经历过国共对比，大多数拥护共产党，都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的。作为见证人，我来讲一讲，权当给历史留下点记录，帮助后人了解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。雷锋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，他是真实存在的，雷锋的思想基础是绝对可信的。我觉得，某种意义上，我父母是知识界的雷锋。📖